

■ 高全之

顏元叔的文學與文化關係層面

——評「文學的玄思」 (註1)

顏元叔在這本共計一九〇頁的書裏標榜了兩個口號：「文學是哲學的戲劇化」以及「文學批評生命」。由於這兩個口號裏的關鍵字眼「哲學」、「批評」都被刻意的廣義化，所以它們做為大前題大致是可取的。前者屬於文學內在的課題，後者論述文學與文化的關係，都是文學工作者值得探索的大路。然而顏元叔在文學與文化的關係層面上，基於某種原始成見以及由此而生的道德憤慨，做了我們可予同情，不能同意的努力。

我們發現：一個過度熱切的文學本位者，以人文主義的代言人自居，其見識必小，偏失必有。本文推究這種偏窄人文主義的固執，其原因為：誤解科學涵義，科學知識（或說常識）匱乏。

一部摩托車所代表的類人的心思智慧
。決不亞於一首詩所代表的類人的心思智慧

胡適 (2註)

在缺乏明確「科學」語詞界定的前提下，顏元叔常常把科學與文學甚至科學與人文主義當作對立的東西來看，兩者似乎互不相容而且可以截然一分爲二。隨手摘錄兩段文字：

「我要特別強調，今後科學、技術、與經濟三連環所產生的局勢，給予人文主義的威脅最大……人文主義應該有挽狂瀾於既倒的宏願。」

(第一八八頁)

「新批評學派的人士把整個的人類文化的危機全部歸罪於科學及工業化。……我們可以承認科學對人類前途具有實際需要；但是，從歷史觀點來看，新批評家的認識不算乖僻吧。」(第一一四頁)

我們不妨引用康特博士「科學的人文主義與大學」一文(註3)做爲批駁(在這篇富啓發性的論文裏，科學被界定爲一種客觀理解——人類獨立秩序、秩序力量、定向物力論——的經驗，以及一種主觀上創造的附屬的不斷進步的知識的經驗)：

「科學引起人類與事實的一種全新的觀念，所以科學的人類是一種新的人類。由此言之，科學的人類不滿意於任何反科學形式的人文主義。只因該主義係基於一種事實的反科學見解。因此兩種文化之間的分裂說明了傳統人文主義之不適當。……更壞的是這種人文主義自稱爲唯一可以接受的人文主義之形式的時候，必然對科學的人類有害。然而爭論是沒有結果的。只有在我們想超出爭論範圍以外的時候，才知道科學的人類並不反對人文主義的價值。……科學的人類要看最不满意於另一種

文化到底是爲了什麼，這是一種挑戰，並非一種拒絕。我在此地想要列舉一種在科學上可以接受的人文主義之精益求精的主要需求。(一)人文主義必需客觀。：故其反對任何形式的主觀主義與先天論。……(二)人文主義必須具體。……在人類與物質實體的殘餘之間有一種連續性。……科學的人類並不反對精神……科學的人類並非是反有神論的，但是當然唾棄基於一種自滿的和近代科學勃興以前的世界觀。……所以科學的人類在哲學裏面所反對的東西主要是哲學體系之關閉，使這些體系不能同化預料不到的新的知識片斷：必須伸展到倫理的領域……科學的人類根本是富於創造性的，所以一種令人滿意的人文主義必須幫助科學的人類更加了解並且更有成果的發展這種創造活動。……」

稍予比較即可看出：顏元叔所說的（「應該有挽狂瀾於既倒的宏願」的）人文主義，是舊有的範圍窄小的人文主義。如果我們借用康特博士的「科學」界說，或康南特在通俗著作「科學入門」（註4）裏的界說，繼續討論，我們立即發現：舊有的人文主義不僅不能包容科學與工業化，而且更無法解決高度工業

化所帶來的現代文明社會的問題。事實證明，科學在三個世紀以來，已戰勝宗教以及舊有道德規範的愚昧面。舊有的人文主義必須（而且就某些方面而言，已經）接納科學而企圖建立一種新的人類信仰、社會秩序、道德規範——那就是說，一種新的人文主義。科學以及高度工業化發展所造成的人類危機從沒有被忽略。當科學被視爲一種（新的）人文主義的經驗、涉及全人類的一種經驗時，這些危機立即被認定爲一種「人」（而不是概念上模糊不清的對象：「科學」）的問題被汲於解決。人文主義的擴大（不僅於字義上的廣義化）是沛然莫之能禦的趨勢。所以顏元叔「從歷史觀點來看」，是回顧（不够真切）而未前瞻，鑑往而不知來。

我們不妨追論顏元叔（在缺乏嚴格界說下）對「科學」一詞的了解。我們摘錄「從文學看科學」一文中所說的三點「人文主義對科學提出若干探討」：一、價值與數量：「文學及包括文學在內的人文學是價值問題……科學不是價值問題，科學以數學爲基礎，從求證到證果，全是數量學問。……譬如，從原子彈

公式的形成到原子彈的製造，整個過程是數量問題，不是價值問題。原子彈爆炸之後，才會引起價值問題。」二、慾望與剋制：科學家消極助長了個人主義與自我中心意識，而且促使人類「一味滿足他的肉體慾求」。而「人文主義者不能承認物質的慾求與滿足，即是人生的一切」，故「文學與宗教之道當不是科學技術之道。前者是聖賢之道，後者是小人之道」。三、知識與智慧：「我個人深信有些知識是不能追求的，是禁知 (forbidden knowledge)，並非一切知識都是善良的。科學家不能以求知一念，作為他一切求知活動的充分理由」。「倘使在知識與人類之間作一抉擇，科學家寧可犧牲人類，成全知識；人文主義者則無有這等忍心了」。

我們仔細分析這段文字所透露的科學觀念（極富認識論趣味的），它們幾乎完全落入前引康特博士論文的「1.緒論：幾個普遍錯誤的科學觀念」部份）：(一)科學根本是客觀主義，科學是絕對不具人格的。(二)科學是一種完全正當的知識冒險，但是由於它天生傾向誇大，所以必須壓制以防其超過它的自然限制。稍予留意這段漫長的文字由責備科學而（不得不

轉移為）責備人（科學家），即可抓住要點。科學雖然以客觀為其要求，但是它無法是客觀主義的。它是一種整個的人類經驗，一種日益成長的人的參與。基本上它無法不主觀，並且具備人格。科學的日益進步並沒有保證人類道德精神之進步，以致科學發展「帶來了」壞影響。所以我們由人的敗壞，傳統人文主義的破產，而意味到一種新的人文主義的迫切需要。在一種新的（接納了科學的）道德認同上，對人的慾望（乃至科學的發展）重新估價或許是可能的，但那決不意味着一種敵對的、空泛的人文主義的「禁知」。是「人」本身的問題，而不是「科學」「知識」的「善良」與否的問題。試借其原子彈的譬喻（極有意思的是，這種比喻竟中了康南特的話：「或明或暗反對科學的人，腦裏首先想到的是科學用於戰爭，特別是原子能的應用」——註5）：為何原子彈爆炸之後才會引起價值問題？所謂的價值問題應該追溯到當初發明原子彈的動機的時候，或者更遠。原子理論的探索基於科學家的求知慾，而應用原子核分裂原理來製造原子彈就是「人」的問題：領袖慾、統治慾等等。近而言之，原子彈造成之後的決定使用，也是「人」的

問題。侵略者不僅不盡是科學家，而且較可能為（科學家之外的）政治家、軍事家、哲學家等。科學家不但應該（大概也不敢）單獨負起「犧牲人類」的大罪，而且即使前述科學家的罪狀成立，也不必牽強的把帳記在（缺乏明確界說的）科學身上。一點淺顯的科學發展史的知識告訴我們，「每當一門現代科學開始成形時，激烈的論爭總比理性的意見易於自筆端流出」，「一個科學研究者踏入研究室，必須嚴加自律的觀念，只是逐步演進而來的」，發展到今天，「卽令是煩焦易怒的人，在自然實驗室中也很容易變成公正而精確，這完全是社會學上所說的特定社會環境使然」；然而，只要科學家離開了他的職業紀律，往往還不如常人般公正和自約；所以，「作為一個人，科學研究者亦如常人一樣地賢愚不等」（註6）。這就是再度說：作為一個人，科學家與非科學家是平等的，他不必更善良，或（如顏元叔所意指的）更凶殘些——這與柏拉圖自理想國趕走詩人一樣是有趣的奇想。所謂「價值」「數量」之分毫無意義，「禁知」之說更是迂不可及。科學是創造的、附屬的，以及不斷進步的。

由此使我們想到楊君實對錢穆「史學導言」的第二點批評：「錢先生大文中，常常喜歡把史學與其他應用科學對立起來看，有時候還頗有截然一分爲二各不相涉的意思，彷彿史學的科學性十分獨特，其在應用上，和其他科學毫無溝通餘地似的。這種想法也是我們引爲心驚而不敢苟同的」（註7）。基本上錢、顏所失是相似的。

在「文學與文學批評」一文裏，顏元叔認爲文學的最終目的是教育良心；所謂教育良心，可分兩方面來說，一是發掘自我，一是擴大自我。這兩項是人文教育的主要目的，所以「當臺灣手忙腳亂進入其遲來的維多利亞時代的端頭，站在人文教育中堅的文學工作者，有着阻止赫胥黎型的『半邊人』的出現的使命」。

赫胥黎與阿諾德的爭論可以在梁實秋「偏見集」裏「文學與科學」一文看到大概。（顏元叔只如上文一筆帶過「半邊人」，沒有任何說明。）假設梁實秋的文字可信：當時爭論的題目是英國當時教育上應以文學還是以科學爲重。古典研究學者阿諾德主張「如

人性不變，文學的魔力是不可抗拒的」。因為，「文學是人生的批評……批評人生最好的方法便是研究古典文學和近代文學」。但是他所謂的文學是廣義的，歐幾里得與牛頓的著作都是文學。赫胥黎承認「人生批評是文化的精髓」，但不承認「文學所包括的材料足以構成這樣的批評」。至少在教育上科學與文學有同等的重要性。當時這個爭論雖然持久，最後却没有決絕的結論。

赫氏主張文學與科學在教育上並重，阿氏所謂的文學也是廣義的。我們今天回溯這項不了了之的爭辯，實在不能了解何以顏元叔如此強烈的（呼籲）要阻止赫胥黎型的「半邊人」出現在臺灣。我不願意在身邊缺乏臺灣教育現狀資料的情形下，（只憑個人的「觀察」）頂撞這種「使命」。但是我們以為「文學」與「科學」如果是既已形成概念的自明名詞，或者兩者在寬大的界定下仍無法截然分割，則分別代表的研究領域，步驟上與精神上應是互相諧和的（雖然在短期推展上或有急緩之分）。古人論學分義理、考據、辭章三部份，姚（鼐）、戴（震）以為三者不可偏廢，就是各種學科（容或有消長併分）在觀念上平等重

要，相輔發展的教育觀念。子水文存（註8）在「一切成系統的學問都是科學」的界說（註9）下，有一段堪稱持平的話：

「一切人民……都應該有科學的常識。」

「我覺世俗有一種誤解，就是許多人都以為自然科學的用途只在增進物質上的文明，而和人類的精神文明沒有關係……我們的物質生活，固然需要自然科學的知識；我們的精神生活也一樣需要自然科學的知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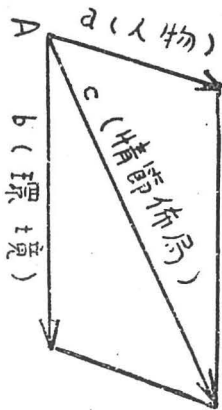
「要利用自然科學，非以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為指導不可。其實，現代大部份的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是用了許多自然科學的知識來做基石的……。從這種事實想起來，我們可以約略看出各科學知識是互相關聯而不能畫出很清楚界線的。」

「創連適合時代的新文化……只有現代科學才能正確的回答這個問題。」

或許我們有必要留意這本書的一項特色：多次引用科學（或說數學）語詞，但是大部份根本誤解原意或濫用了。這個特色可以幫助我們於追論其誤解科學

觀念之後，進一步追論其科學知識的匱乏。這進一步深入的討論或許可以找出舊有人文主義者的病根來。我們分別討論如下：

(1) 第四五頁：



「這是一個平行四邊形。根據力學原理，假設有a與b兩個力量，同時作用於A點，則a與b兩力形成一個合力，向c的分角線的方向進行。」

錯誤是：平行四邊形的對角線並非（除非鄰邊等長）該底角的平分線。平分一角的射線簡稱為分角線。顏元叔誤以為分角線是「分割一角的射線」，顯然是望文生義的結果。

(2) 第十一頁：

顏元叔引雷辛 (Lessing) 及「現代文評家的觀

點來」強調文學特質。依照他的見解我列成下表：

文學——一元方程式	}	時間藝術
音樂——多元方程式		

雕塑——空間藝術

我們十分奇怪顏元叔在引用雷辛 (1729—1781)

「時間藝術、空間藝術」的分法之時不但沒有對其做較清晰的說明，而且忽視了近代藝術（文學、音樂、繪畫、舞蹈……）突破各自傳達介質限制 (medium restriction) 的趨勢（註10）。當我們輸入西洋文

學理論的時候，一種史的觀察意味着一種責任良心。除此以外，我們無法同意「一元方程式，多元方

程式」的說法。如果它成立，則因為多元方程式是由一元方程式推廣而來，一元方程式是多元方程式的特例，所以「音樂是文學推衍而生，文學可以併入音樂的範疇裏去」。我懷疑這種缺乏文化史證據的證果是顏元叔所樂於見到的。

(3) 第七六頁：

「對西洋作品，我以為可以模倣其手法，而不可模倣其題材」，而且「他們（筆者按：指中國文學系及中國文學的專業人員）應該不斷的研究舊文學，將

舊文學予以新估價，使千百年前的作品，能藉他們的不斷討論，繼續生活在現代中國人的意識裏」。以上兩段話大致是不錯的。但是下一句：「筆者以為要產生一個中國民族文學，積極研究中國舊文學，是『必要條件』；而有條件地吸收西洋文學，是『充分條件』」，問題來了。

根據數學上的用法：對敘述P和q而言，若命題「若q則p」成立，則稱q為p的充分條件，或稱q為p的必要條件。現在根據顏元叔的原意，應該這麼說：

「積極研究中國舊文學與有條件地吸收西洋文學是產生一個中國民族文學的充分條件」，或「產生一個中國民族文學是積極研究中國舊文學與有條件地吸收西洋文學的必要條件」。如果依照原書所用的充分、必要條件，則原敘述等值於以下兩個命題：

「若產生一個中國民族文學則積極研究中國舊文學」。不通。以及——

「若有條件地吸收西洋文學則產生一個中國民族文學」，又似乎不是顏元叔所願意犯的粗率觀念。

(4) 顏元叔勇敢的用了「常數變數」(第二一頁)

、「排列組合」(第五四頁)、「行列式」(第一七一頁)等數學語詞。我們或可同意這句的用法：「文學的人生與實際人生的最大差異，也存在於這個排列組合中。前者有排列組合，後者沒有」或「文學形式是常數，文學內容是變數」；因為「排列組合」、「常數變數」在這裏可以望文生義，並不完全依賴(也並不嚴重違反)它們在數學裏的意含。但是像這句：「一位作家僅僅了解永恆的人性：是不够的；他必須了解人性所處的現代時空，才能了解這個時空裏所發現的方式。我稱這個時空的結構為文化的行列式」，「文化的行列式」就此一筆輕輕滑過，沒有加任何一字引伸發揮。我以為如果顏元叔對「行列式」(determinant)「(或「矩陣」(matrices))」的了解充裕，大可以就行列式(或矩陣)與文化時空結構的共通性加以發揮，不必如此故弄玄虛。

顏元叔立異以為高(註11)的意圖是很明顯而且十分失敗的。像論到詩的「經驗格式」與「過渡性」，雖然有可喜的創見，但是有這麼一句：「……許多詩人的象徵太個人化，以致完全不能傳達給一般讀者，完全缺乏過渡性。」(請注意兩次「完全」否定的

意含)；論及「晦澀與艱深」則：「一個現代詩人，難如維多利亞時代的鄧尼森，所想所感，都是一般人的所想所感」(請注意「都是」肯定的意含)。不僅主觀、武斷、包容性小，而且違反了一項科學觀念：凡兩事相比，容有比較上相對的差異，但不會有完全絕對的差異；因為「參考座標」(或說「論事的觀點」)不同，就會產生不同的「座標」(或說「結論」)。我們讀同這種說法：「相對論的影響遠超過科學範圍，本身已形成一個主要的哲學體系……」(註12)。我們不必拒絕一種通達的論事態度。

顏元叔既站在舊有人文主義的陰影裏敵視科學，又引用許多科學語詞以壯行色，以示「科學豈奈我何？」，這種心理很有意思。由上面所討論的(高三理組學生就可以指出的)濫用誤用的實例，我們發現了(文組學生)顏元叔科學知識(其實是常識)以及邏輯訓練不足。

在這本書裏，顏元叔至少闖了以下兩個禍：一、科學知識以及邏輯訓練不足，濫用誤用科學語詞。二、過度強調了文學的本位主義，誤解科學涵義，沒有抓住科學精神，抱着早已破產的舊有的人文主義不放

。但是最大的一個禍事是：一個可佩的高等學府領導者以及西洋文學思潮引入者，在他自發的文學理論裏不可輕饒的錯誤，可能造成嚴重惡劣影響。

科學對顏元叔抱殘守闕式的人文主義，應該是一項挑戰，而不是拒絕。顏元叔「朝向一個文學理論的建立」意圖是可敬的。想要產生現代中國民族文學，應該有一套現代中國民族的文學理論。它不僅是中國的，而且應是國際的，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我們以為客觀、持平、包容性是這個(可企待的)文學理論應該具備的特質。這三項特質似乎只有中國人才能兼具。比如西洋或倡唯心論或倡唯物論，兩者形同水火，而國父首創心物合一以兼容並包；古人早有「中庸之謂道」的說法，孔子也有「吾道一以貫之」的認同。可見中國人自有講求諸合，避免尖銳化和極端的一面。現代科學之父愛因斯坦晚年致力於統一場論的完成。現代科學之父愛因斯坦晚年致力於統一場論的完成，精神上和儒家「一以貫之」不契自合，可見就某種程度而言，儒家與科學的終極目的是相合的。這種道理或許中國人最能體驗，這種文學理論，易於由中國人完成，也應該由中國人完成。

註 1

驚聲文庫——民國五十九年元月三十日初版。本書與「文學批評散論」（驚聲文庫2）同時出版。對於這本批評散論裏幾篇論及科學與文學關係的評論，我們可以參照本文去讀。

註 2

胡適「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收入「胡適文選」：六藝出版社，民國四十二年三月臺二版。引用這句話，等於同意胡適這篇文章的前題：「精神的」與「物質的」不可嚴格劃分，而是互輔相成。但我們未必同意該文在此前題之後所做的推論。

註 3

康特 (Enrico Cantore) 博士這篇論文原名 Scientific Humanism and the University，原載一九六八年秋季美國紐約 Fardham 大學 thought 季刊。本文所引係水牛雜誌第四期李永久的譯文

註 4

康南特 (James B. Conant) 曾任哈佛大學校長二十多年，這本書原名 Science and Common Sense，耶魯大學一九五一年版。本文所據為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今日世界社趙盾的中譯本。在這本書裏，康南特定義「科學」為：「實驗與觀察的結果產生概念與學說，舊有的概念與學說又衍生新的實驗與觀察，科學

註 5

便是這些概念與學說的互相聯結體」。這一定義的重點在「衍生」兩字

註 6

「科學入門」第14頁
「科學入門」第8頁

註 7

楊君實「讀史學導言第一、二講」，五十九年四月九、十兩日中央副刊。錢穆「史學導言」，中央日報社五十九年五月初版

註 8

文史新刊4，五十八年十二月一日初版

註 9

毛子水這種界說在「科學入門」裏被稱為「靜的科學觀」，詳見「科學入門」

註 10

葉維廉在現代文學第33期「現代中國小說的結構」裏稱這種趨勢為「無意識中為推翻萊辛的區別」的

註 11

立異以為高，其實頗合韓愈教人做文章的主旨。但是韓愈（「答劉正夫書」）教人立異（獨創新格）有三個途徑：①為文「宜師古賢人」②「師其意，不師其辭」③文「無難易，惟其是爾」。我們考量第②第③點，可以窺見顏元叔偏頗的原因

註 12

巴涅特原著，仲子譯「相對論入門 The Universe and Dr. Einstein」，今日世界社一九七一年四月再版。